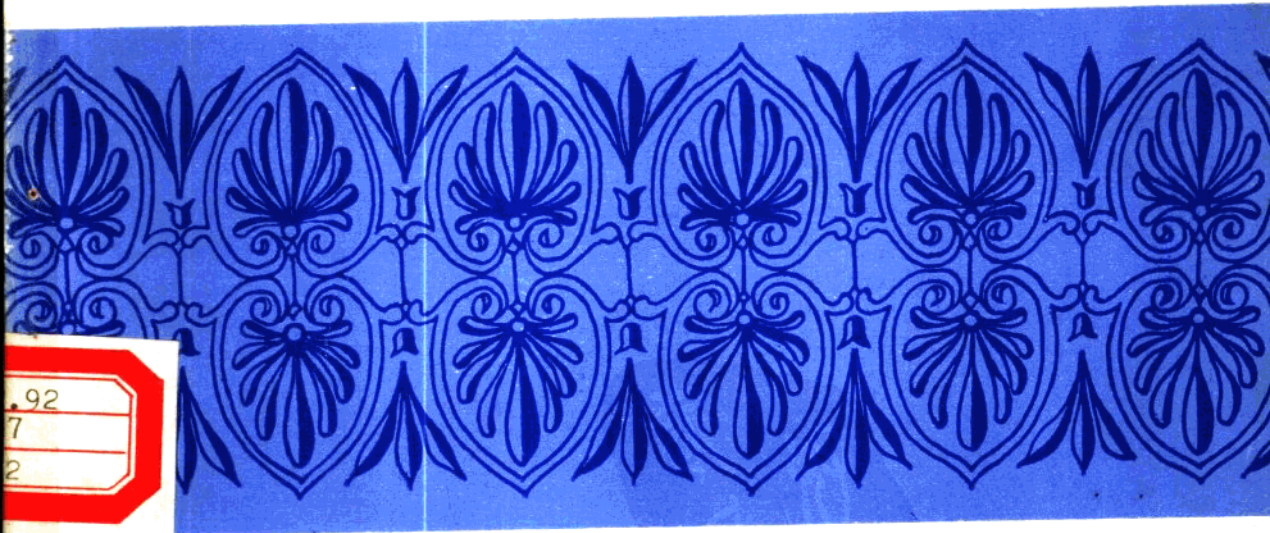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文丛

XIBEI MINZU WENCONG



西北民族文丛

XIBEI MINZU WENCONG

第二辑

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_{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



西北民族文丛

编辑：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研究所
印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内部刊物·

本辑成本费：¥1.00元

1983年10月



西北民族文丛

一九八三年 第二辑

目 录

· 民族理论 ·

- 关于民族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辨 郭卿友 (1)
论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郝时运 (12)

· 民族史论 ·

- 商族史问题析疑 关意权 (20)
试述历史上的“铁勒” 张 炼 (33)
——兼论铁勒是维吾尔族的先世
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马贸易 汤开建 (48)
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 白翠琴 (66)
今本《元史》散逸在外的两个列传 达 健 (79)
青海撒拉族土司述论 王继光 (84)
试论“满四之乱” 谢玉杰 (93)
略论一七八一年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反清起义 贾东海 (98)

· 民族宗教 ·

- 论述元、明时期西藏佛教在蒙古和内地的流传 孙尔康 (103)
试论清朝前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马明达 白文固 (116)

· 民族译文 ·

- 蒙哥汗碑铭注释 [美] N·贝波等文 胡斯振译 (128)
突厥语民族古代历史概述 [英] 杰·克劳森文 李国香译 (134)
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 王静如译 (143)

· 民族历史人物 ·

汉代乌孙族政治家昆莫猎骄靡及翁归靡·····	苏北海(147)
回纥可汗骨力裴罗父子三代·····	龚也昌(150)
元代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	樊保良(155)
杰出的蒙古民族英雄渥巴锡·····	饶以诚(158)

· 民族图书评介 ·

C·E·马洛夫及其《黄维吾尔语》·····	曹纯等译(162)
-----------------------	-----------

· 民族研究动态 ·

一九八二年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概况·····	杜荣坤(167)
——节录西北民族史研究部分	

民族科研简讯四则

民族小资料六条

编者说明····· (封二)

★ 民 ★ 族 ★ 理 ★ 论 ★

关于民族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辩

· 郭卿友 ·

应先说明：对于民族理论我是个小学生，一切都在从头学起。这篇文章是我在自学中所遇到的疑点和初步的思辩。尽管它是肤浅的，不成熟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愿把它拿出来，以期冀为师者的指教。

一、“民族主义”概念的质疑

什么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列宁和斯大林曾做过这样的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①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② 无产阶级政党是用“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③

列宁、斯大林在特定条件下的这些特定论述，后来被人们视为教条，照搬照抄，奉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的经典。现将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外有影响的几本论著因袭照搬情况抄附和比较于后：

《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尤金编）：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第一次产生的历史范畴”；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无产阶级“是确立国际主义而消灭民族主义”。

《辞海》（一九八〇年版）：“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现代汉语辞典》（一九七九年版）：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尽管在具体提法上，它们稍有差别，但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无产阶级只要国际主义，不要民族主义。

这样，民族主义就如同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一样，在理论界和一般人们

①、③《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三五八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八七页。

的心目中，成了资产阶级一家独占的专用品，不断地遭到批判，名声很臭。

这个长期被人们视为正统的概念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我看值得商榷。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根本”，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去正确地解释它们是怎样的“历史范畴”。具体地展开来讲，我认为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一）从宏观上来说，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较长时期存在的“历史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所独有的“历史范畴”。

诚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民族，只有资产阶级才有民族主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民族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近年我国学术界对民族的概念、起源及形成问题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意见。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民族并非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历史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民族”是个普通的历史范畴，存在于人类社会几种不同形态中，那么，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阶级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解，即“民族主义”也必将是个普通的历史范畴，存在于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

其实，这个问题在斯大林的早期论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中已经说清楚了：“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阶级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而且每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利益，并且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斯大林在这里说的“各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就是给“民族主义”下了定义。他并用这种阶级观点划分了历史上曾出现的几种“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类型：

封建“贵族的‘民族问题’”和“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①

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他解释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中所说的“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指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

斯大林这些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野蛮民族”、“游牧民族”，以及列宁关于“落后民族”、“现代民族”、“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和“无产阶级现代民族”等等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都把“民族”做为普通的历史范畴，并以阶级和社会形态来加以划分。

斯大林提出的“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论断，打破了资产阶级对“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垄断，是彻底的唯物论的。可惜他这篇早期论著似乎被后人所忽视。

马克思说：“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就是历史上各阶级理解民族问题的共同意识

^①《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〇页。

形式，只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内容罢了。

(二)从微观上说，“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范畴。

我们在上面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认定为普通的历史范畴，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历史范畴，是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做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从宏观、纵观的角度上讲的，说的是矛盾的普遍性；这里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认定为具体的历史范畴，而不是抽象的历史范畴，是说当我们识别和评定某个具体“民族”和某种具体“民族主义”时，应该进行横观、微观，强调矛盾的特殊性。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再则如果是讲到一个国家（例如，讲到该国的民族纲领）就要注意在同一历史时代以内该国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具体特点。”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族”、“民族问题”和具体的“民族主义”，而没有抽象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抽象的“民族主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民族问题”，而该时代、该民族的不同阶级就有不同的内容、不同性质的“民族纲领”或“民族主义”。因此，我们在鉴别和评定某个“民族”和某种“民族主义”时，就应该从这个“民族”和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出发，而不应该把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主义”的结论拿来套用。

“民族主义”、“民族平等”的口号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它要求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廓清道路。无疑地，这个“民族主义”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固有的矛盾和发展，资产阶级就势必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抢夺和扩张殖民地。这样，民族主义就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对外掠夺被压迫民族，对内宣扬阶级合作、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反动思想工具；而在一些大垄断资产阶级国家里，这个“民族主义”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合流时，就更具有疯狂的侵略性和野蛮性，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就是在“大日耳曼主义”、“大和民族”的叫嚣声中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烈火的。显然，这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原来初生时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是它的一种“变种”。不能因为都是资产阶级的，就在两者之间加上等号。

同样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个“民族主义”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因此，它是被压迫民族觉醒的标志，是民族团结的旗帜，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动力。因此，它不但具有进步、爱国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反帝革命的性质。直到今天，在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个“民族主义”和民族斗争在抗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潮流。

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代，其内容和性质竟如此大相径庭，怎么能够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民族主义”一律骂臭呢？

(三)“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历史范畴，而不是从属于“阶级”和“阶级观念”的历史范畴。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民族”与“阶级”，“民族观念”与“阶级观念”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历史范畴。

相互联系在于：在阶级社会，每个民族内部都是划分为阶级的，而每个阶级又都属于一定民族的，因此，超阶级的民族不存在，超民族的阶级也不存在；每种民族观念都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打上特定的阶级意识的烙印，而每一种阶级观念又都具有特定的民族特征，打上了特定的民族意识的烙印。

相互区别在于：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为特征构成的人们的共同体；阶级的存在是与人类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相联系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和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划分的社会集团；民族观念是民族存在的反映，阶级观念是阶级存在的反映。因此，民族与阶级，民族观念与阶级观念各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这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矛盾，在阶级社会是这样地对立统一着：既没有不分裂为阶级的民族，又没有离开民族而独立生存的阶级；阶级社会里的每个人既是阶级的一员，有特定的阶级的观念、阶级的感情、阶级的利益、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同时，他又是民族的一员，有特定的民族观念、民族的感情、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阶级性与民族性是阶级社会每个人兼有的两种社会属性。这两种社会属性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着。其主从地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着的。一般说来，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剧烈时期，人们的阶级观念往往占着主导的支配的地位，民族观念降为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在历史上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革命战争中，往往是各民族的被压迫阶级联合在一起，而各民族的统治阶级又结成联盟，就是这种阶级观念支配的结果；当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尖锐时期，人们的民族观念往往就上升为主导的和支配的地位，而人们的阶级观念就会下降为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全民族的各阶级联合的抗斗争，就是以这种民族观念为思想动力的。

我们把民族和民族观念看作相对独立的“历史范畴”，其理论意义在于：必须划清民族与阶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民族观念与阶级观念之间的界线。鼓吹“民族至上”，用民族、民族斗争、民族观念去否定或代替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念是错误的；宣扬“阶级至上”，用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念去否定或代替民族、民族斗争、民族观念也同样是错误的。

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认定为普遍的历史范畴，具体的历史范畴，相对独立的历史范畴——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是我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的理解。

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其特征

“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能否成立？关键是在于如何理解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地把“民族主义”看做资产阶级的口号，看做是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因此，就很难同意这个命题。似乎无产阶级只有国际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只能称为民族纲领或民族政策，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才叫做民族主义。

显然，这种对“民族主义”狭义地理解，完全是把“民族主义”做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思

想范畴的。究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这里再重复几句，以便进一步地探讨。

为了说明问题，现仅就个人所涉猎并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出现过的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含义的“民族主义”类型分列于后：

“沙皇君主政体的民族主义”^①、“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③、“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④、“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农民的民族主义”、“黑帮民族主义”^⑤、“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⑥等等。

此外，在经典著作中，在运用“民族主义”一词时，前头还常常加上“有害的”、“狭隘的”、“反动的”、“反革命的”、“革命的”^⑦等修饰语；或加以“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等等民族的限定词。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中，不但有封建君主、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区分，而且还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可见，马克思经典作家是把“民族主义”作为普遍的思想范畴，广义地理解和运用的。即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民族主义”。当然，无产阶级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了。

斯大林在早期著作中，已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命题^⑧。毛泽东在论述三民主义时，也曾说过：“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或称“民族革命主义”。^⑨这种“彻底的民族主义”、“民族革命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民族观、民族纲领、民族政策等等提法只是具体名称的不同，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当前开展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口号，但并不能由此就断定只有资产阶级才有人道主义。历史上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人道观，“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人道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产物”。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平等、人道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名词的外在思想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在的思想内容和阶级特征。

那么，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称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的阶级内容和特征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无产阶级民族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因此，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民族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指明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民族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就“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⑩。“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

①《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四四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页。

③以上见于《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五四二—五四八页。

④《列宁全集》，第二〇卷，第一—三五页。

⑤以上见于《列宁选集》第二卷，五六四—五六六页。

⑥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八三页。

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灭。”^⑧

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个特征，使它和其它阶级的民族观相区别。它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从渺茫的空中拉回到了地上，成为一种现实，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这样，民族理论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这样说过：“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有“宇宙观的不同”、“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界限。

(二)无产阶级民族观把民族问题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份，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从而为民族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步骤。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放”。遂后他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这样，民族问题再不是一个孤立自在、盲目自行的问题，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总体的一部分，并在这个总体中找到了自己解决的道路和步骤。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封建主义民族压迫的基本消除，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民族问题则改变了性质，成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搞好这个总问题，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颠覆活动，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只有搞好这个总问题，尽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才能真正克服各民族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同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才能真正发挥和体现各民族的特点，实行民族化。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中华民族走向平等合作、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三)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列宁认为：“必须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⑨各国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援，相互学习，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⑩“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⑪。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祖国，更热爱自

⑧《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十七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五六—三五七页。

⑩《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三一九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〇页。

⑫《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七二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二七页。

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〇八页。

己的祖国。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英勇斗争，维护民族的尊严与气节，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是崇高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既是爱国主义的事业，又是国际主义的事业。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与归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又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升华与提高。它们是无产阶级民族观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在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统一。

提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是我对“民族主义”概念的质疑与思辨的必然结果。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人为制造的资产阶级对于人类历史思想文化之一——民族主义的垄断，恢复无产阶级与它之间的被割断的联系，更在于揭示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内涵与特征，指导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这是我的主观愿望。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陷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与封建主义的民族压迫是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根源；因此，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主要内容。以上是当前理论界关于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论点。姑且称之为“两个论”吧。

我觉得这样泛泛地谈问题是不够的。因为“两个论”中的“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近代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近代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奴役、宰割的民族。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最基本的国情。只有抓住这个最主要的矛盾，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才能正确评论中国近代民族问题。

（一）从总体上讲，这个最基本的国情不但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必然高涨，而且还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必然以反帝为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因此，它必然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性质。

西方列强的大炮曾先后征服了中国近代几个反动朝廷，但它并没有征服整个中华民族。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就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形势下，除了少数的民族败类投敌叛国外，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地主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都是反帝的。中国近代的一切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始终没有离开反帝救国这个基本点。拯救中华、振兴中华是近代中华民族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思想潮流的主体。尽管这些爱国反帝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是由不同阶级领导的，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和阶级特征，但都没有离开这个主体，都是以民

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思想酵素发展起来的。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而走向革命，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而走向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是近代中华民族先进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曾遭受了帝国主义大规模地、不间断地、疯狂的侵略，残不忍睹地屠杀和蹂躏。但是，我们的祖国屡遭大难而不死，几经危难而不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之心不死、爱国斗争不止。这种爱国斗争如同黄河怒涛、长江巨浪奔腾不息，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林则徐面对帝国主义炮舰毫不退让，一把怒火把英国的鸦片烧掉；关天培守炮台“徒手犹搏战”，以身殉国；陈化成战吴淞“疾呼誓杀贼”，与阵地同亡；在甲午海战中，邓世昌和他的战友驾驶受伤的战舰向敌舰扑去，惊破敌胆；义和团用大刀长矛敢斗八国联军洋枪洋炮；陈天华怀国恨投海自杀；方志敏在狱中不忘“可爱的中国”；杨靖宇吃草根、树皮和日寇搏斗到最后一息；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要美国的救济面粉。为了祖国的独立与解放而英勇献身，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正气，民族思想的精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思想动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八路健儿轻生死，不报私仇报国仇。”这些光照千古的诗句，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是民族的正气歌。正是这种民族正气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高涨，才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这里应该指出：在近代中国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各兄弟少数民族是和汉族并肩战斗、功劳卓著的。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次包括汉族、壮族、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兄弟民族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多半个中国。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更成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邓恩铭就是贵州的水族。壮族的韦拔群，回族的郭隆真、马本斋都是杰出的革命英雄。赣南闽西的畲族、湘鄂的苗族、土家族，左右江的壮族、瑶族，海南岛的黎族，陕甘的回族，都曾为建立和保卫革命根据地而英勇斗争；1935年红军在长征中，又把革命的种子撒在了少数民族地区，藏族人民曾在甘孜建立了博巴革命政权。在抗日战争中，内蒙古人民积极参加了察北抗战、百灵庙抗战、绥远抗战；活跃在冀、鲁一带的回民支队声震华北。到解放战争时期，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更如火如荼，形成了民族革命的高潮。一九四八年以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新疆三区革命斗争，为新疆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应该指出：在近代，帝国主义强盗的魔爪总是不断地伸向我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俄、日在东北、蒙古，英、俄在新疆，英国在西藏，法国在云南、广西、贵州，搞了那么多的颠覆、分裂活动，妄图把这些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但这一切阴谋都没有得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祖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反帝爱国斗争中相依与共，结成了牢固的民族团结和战斗友谊。少数民族多地处边疆，站在反帝斗争的前沿，为保卫祖国领土、维护祖国统一立了大功。

(二)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各种具体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功过是非的评价，必须以反帝和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作为最基本的标尺。

由于中国近代除了外部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之外，还有内部的封建主义的民族压迫；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各民族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政治地位的不同和民族观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阶级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主义和不同的民族运动。应该用什么为标尺去评定它们的性质和

功过是非呢？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讲演中说：“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对于中国近代各种民族主义、民族运动性质与功过是非的评论，显然不能简单地以阶级划分为标尺，不能以它标榜的“民主”、“独立”、“革命”的口号为标尺，而应该以反帝斗争为标尺。是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勾结帝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的独立与统一还是分裂祖国的独立与统一？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试金石。

现在，我试就几个具体问题作以分析。

封建地主阶级是近代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它的民族主义就是对内推行民族压迫主义、对外推行民族投降主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施家奴”、“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们一脉相承的卖国衣钵。但这个结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虽是地主阶级领导的，但它抗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具有正义和爱国的性质；作为地主阶级的左宗棠，曾残酷地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西北回民起义，这是反动的。但他在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期间，曾平定了英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所策动的叛乱，恢复了天山南北路，保卫了祖国领土主权，这又是他的爱国功业；蒋介石一生干尽了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没有去投敌当汉奸，总不能说这也是反动的、卖国的。

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反映了农民阶级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盲目排外性。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农民阶级民族主义仍然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不能根据他们“扶清”来“否定“灭洋”所决定的运动的本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基本点是反满革命，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因此，它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历史范畴；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提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新”就新在它主张反帝，革帝国主义的命。

同样是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同样是由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所领导的，其性质也并不一样。一八八七年和一九〇三年西藏的抗英斗争，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八年云南麻栗坡和马关地区的抗法斗争。一九三三年云南佤族班洪部落的抗英斗争，虽然都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领导的，但它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就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像一八六五年英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利用新疆人民反清斗争，策划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一九一二年达赖十三世勾结英帝国主义阴谋成立的所谓“独立政府”；同年，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封建主勾结帝俄所煽起的“独立运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反动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发动的所谓“高度自治”运动；以及一九三二年清朝余孽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所建立的满州国，等等所谓“民族运动”，尽管都打着“独立”、“自治”的旗号，但它们投敌叛国，分裂中华民族，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民族保守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误国教训

在民族理论战线上，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已经早为人们所注意，而民族保守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错误思想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似乎它们只是

“保守”一点、“虚无”一下而已。其实，这个“保守”与“虚无”绝非小恙，而是严重地干系于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现就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误国教训，作一扼要剖析。

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和商品毁击了中华民族古老的与世隔绝的封建壁垒。中国近代爱国救亡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落后的贫弱的封建主义抗击先进的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民族观与爱国观。民族的先进分子在救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形成了一种向外国学习、探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潮流。“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鸦片战争前夜，龚自珍在封建统治“万马齐喑”的死寂中，发出了“奈之何不思更法”的疾呼；林则徐、魏源在抗敌斗争中提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洪秀全企图借助西方的“皇上帝”开创农民天国；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智”、“造炮造船”以“富国强兵”；康梁鼓吹“变法”，把“君主立宪”做为图存的妙药；孙中山力主“革命”，又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视为救国的良方。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学西方、救中国”的道路。不管这其中的每一步的阶级属性与功过成败如何，都是民族觉醒的历史标志，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解放思想、救亡图存的进步意义和爱国意义。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保守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中产生的并与之相对抗的两种错误倾向。

民族保守主义是封建宗法制的狭隘性、落后性、保守性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它以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盲目排斥其他民族的先进事物为其主要思想特征。在落后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中国，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提出的“杀洋人”、“烧教堂”、“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这种盲目排外的封建保守主义的思想表现。而这种民族保守主义在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阶级那里，则成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扼杀民族复兴的反动思想工具。误国之害，非可等闲观之。

鸦片战争前夜，当先进的资本主义正在欧美胜利挺进的时候，中国却依然禁锢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中。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对世界的进步一无所知，躲在“天朝上国”的躯壳里自吹自擂、并企图用“闭关锁国”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正是这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封建保守主义，扼杀了中华民族的生机，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遂后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封建顽固势力又照抄这种封建保守主义的老谱。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咒维新变法志士为“汉奸之尤”、“士林败类”，叫嚣“恪守祖训”、“用圣人之道保大清”。封建顽固势力割去了爱国者的头，阻杀民族复兴的一切进路，把中国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他们自己最后也被人民的革命浪涛所吞没；辛亥革命后，从袁世凯、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无不死死抱住这个封建主义僵尸不放。鼓噪起“尊孔复古”、“保存国粹”、“保护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新生活运动”等等封建复古逆流，扼杀民族觉醒和革命运动；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封建的民族保守主义又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集团所复活，他们推行的“愚民”与“锁国”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摧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史证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保守主义始终是与封建主义合流的，是以“保守”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为其主要社会内容的。因此，这种民族保守主义是民族解放与民族发展的对立物。其误国之害，实该认真总结。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

民族虚无主义是对民族保守主义在形式上的反动。它以崇洋迷外，否定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为其思想特征。因此，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都是一种民族盲目性，从盲目排外到盲目崇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常见的通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口号，就是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在批判封建主义和宣扬资产阶级文化的活动中，缺乏历史唯物论的批判精神，大搞形而上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文化是落后的、是坏的，中国就一切落后、一切皆坏；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是先进的、是好的，外国的一切就都先进、都好。付斯年在《新潮》杂志上竟公然声称：“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崇洋迷外思想，后来就形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买办文化。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丧尽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尊严，甘当帝国主义的洋奴走狗，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呢？还谈什么民族解放呢？

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向左转去，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就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把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机械地照搬套用。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中华民族的利益，不问国情地照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要全国人民放下日本帝国主义不管，而去“保卫苏联”、“保卫共产国际”，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这种不顾民族利益、否定民族战争的民族虚无主义必然要丧失民心，丢掉民族大多数，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造成了革命的严重危机。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的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后来，他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又说：“任何思想，如果不能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在这些论述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学习外国的思想文化，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从“实际需要”去学习，从“实际需要”来运用。这也就是他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近代中国人民在这方面是吃了大亏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既吃尽了“盲目排外”的苦头，又吃尽了“盲目搬用”的苦头。这些虽然都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这些沉痛的往事是不应该忘记的。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二大光辉照耀下，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一个崭新的全民族性的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正在祖国大地上崛起。认真总结一下民族保守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在近代史上的误国教训，时刻警觉着它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干扰和侵袭，是当前理论战线一项紧迫任务。

论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郝时运 ·

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若干基本问题，通过解放以来多年的探讨，取得很显著的成果。是非正误基本上清楚了。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定的距离。原因在于一些同志对封建传统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界限，还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区分清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还没有真正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此，我想在学习史学界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介绍一些观点，谈谈自己学习的初步体会。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对历史上“中国”的理解

一九八一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主题之一，与会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很多同志就“中国”一词的起源和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演变等，做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发展概念，从地域上讲，不能确指某一时期的中原封建王朝（甚至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疆域，而应该理解为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劳动、生活、繁殖的这块广阔土地，即形成我国现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地域的历史基础。这种认识方法，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今天也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当然历史基础也是有范围的，作为成熟的观点，应以一八四〇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前的清王朝版图为限。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国家，古代民族、都属于中国史的讲述对象，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和民族。

还有的同志认为：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概念，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是具体的。因此，“以我国的疆域来说，在春秋战国之前，还局处于黄河中下游和江淮流域部分地区。”^①秦统一六国之后，历代中原汉族王朝的疆域则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版图。对于当时与各中原汉族王朝接壤的一些少数民族国家和地区，则不能因为它们今天中国的组成部分，而认为它们也属于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在当时，它们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②这种观点虽然是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但它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贯传统认识而已。

我认为，科学地理解历史上“中国”的概念，应该以今天中国的客观现实为前提，而不是去因袭古人的传统认识。从今天中国的现实出发去认识它的历史，这是不是“企图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的‘框子’，去括套过去整个古代历史时期不同王朝和国家的疆域，”或是“模糊了历史发展的时间观念，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现在的‘今天’”呢？^③完全不是。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

①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载《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②③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无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载《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